

#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梅琼林, 曾 茜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1)

**摘要:**本文从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文化观念变异的影响入手, 探寻文化传播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形成的作用, 认为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乃至其后的现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观念层次的变革基础。

**关键词:**西方文化; 观念; 中国; 国家

**中图分类号:** K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5)01-0081-04

## Forming of the Map and the Idea of Modern Country

MEI Qiong - lin, ZENG Qian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Mass Mediu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pag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on the mutant of China culture idea, seeks the effect of culture propagation to form the idea of modern China “country” and “nationality”, thinks the propag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of idea for the innovation of modernization course of China.

**Key words:** western culture; idea; China; country

倘若从中国历史之角度看, 史家均以中国之近代化历程始于 19 世纪中期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逼迫。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及诸多不平等条约签订之结果, 使向来以“天朝中土, 诸夷咸服”而闭关自守的大清王朝猛然间陷于困厄之境, 被迫开关互市, 并以民族国家的概念进入西方以至世界的视野范畴。而此后中国命运的发展态势, 从洋务运动所行之器物层面改革, 到戊戌变法所言之制度层面变革, 及至最后辛亥一役, 其革新动力及重点也渐从维护王朝权威(即所谓“祖宗家法”)转而向系乎国家兴亡之途更替。因此, 如若从政治观念层面探讨, 则整个晚清时期以迄民国, 诸多仁人志士所孜孜以求的御辱图强之策即附着于“民族”、“国家”观念之上, 而取代了“尊王攘夷”的封建时代理想。故从政治观念发展角度言之,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可以约略概括为从“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历程。

于此, 我们所涉及到的问题是, 考诸中华近两千年王道兴衰更迭之历史, 此种异质观念的流行, 非西方文化传播之力量不可以行之, 而与之相应的是, 中国近代化历程之开始, 虽以坚船利炮之入侵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强制因素, 但由中西文化交融所致的文化观念之变异绝不可被忽视。恰如马克思所言, 社会发展乃合力作用之结果, 故于坚船利炮等外在物质因素而外, 专注于探讨观念层面的变异, 或许可以寻绎出近代化过程之原动力所在, 从而为中国尚未完成之现代

化进程作一镜鉴。

本文即从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的文化观念变异之影响入手, 探寻文化传播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形成的作用, 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作某一侧面之梳理。

言及文化传播, 不能不谈传教士在这方面对于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巨大影响。

依前所述, 史家常以 19 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之逼迫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之开始, 实际上, 若从文化观念层面看, 其潜移默化的文化濡染迟至明末即已开始, 启其端绪者即为明末著名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 1610), 意大利人, 天主教耶稣会士, 1582 年被派至澳门, 次年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先在广东肇庆、韶州, 后北上到南昌和南京。1600 年利玛窦从南京沿水路北上赴京。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记利氏等‘乃越黄河, 抵临清。适督税内官马堂邀功拦阻, 悉将贡物奏章自行上进, 奉旨起取赴京。利子始偕伴八人, 同入燕都, 献天主圣像、圣母圣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大小二具、铁铉琴、《万国图》等物。皇上欣念远来, 召见便殿, 垂廉以观’。于是明神宗同意利玛窦留居北京。”<sup>[1]</sup>(P78)

作为传教士, 利玛窦来华及后来觐见万历神宗皇帝的目的皆为宣传天主教, 但出于沟通及获得认同的需要, 他也带来了西方较为先进的什物器具, 除上文所引艾儒略所记载的而外, “利玛窦在入贡具疏中, 还

提出以西法改历的愿望,故利玛窦所携带和制造的一些西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浑仪、日晷、星盘等”<sup>[1]</sup>。由此可见,利玛窦来华之后的影响实际上不仅限于宗教一途,而更涉及到地理、天文、数学、机械等。而在诸多关于利氏的研究中,史家尤其注重利玛窦自己所绘制的《万国輿图》及后来呈给神宗皇帝的《万国图志》(即前文所引的“《万国图》”),如30年代《禹贡》杂志即专门刊出《利玛窦地图》专号。这说明利玛窦所绘制、编写的輿图及图志(前者为今天意义上的世界地图,后者则是地理著作,《万国图志》即为明末我国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今已佚)对我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简言之,利玛窦所带来的輿图及图志挑战了中国自古有之的世界秩序观念。

从清朝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来看,这种与彼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推动的世界潮流趋于交叉融合的大势相左的保守观念得以占据皇权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主流思潮的原因,实际上在于久已有之,而非仅存于有清一代的“中国者,中央之国也”的传统自大心理,亦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的“中国的世界秩序”。

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一种初步的设想》中,费氏探讨了中国世界秩序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的世界最初是以农为本的文化孤岛。它从华北向处——主要是向南——扩张,把周围地区逐渐吸收进来。它仍然是人们所熟知的世界的中心,而对于古代西方的一些别的中心则知之甚少。后来,游牧民族终于出现于蒙古草原,在中国世界的边缘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中国又较中国贫穷的社会。在战争中,它有时比中国强,但在艺术文明方面却远逊于中国。

中国的世界(天下)从未丧失其一统的意义和文化的完整。即使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公元前403—221年的战国时代),政治上群雄并立,割据称王,但在理论上他们仍然从属于周朝统治者。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统一六国,建立了秦帝国,中国的统一和种族中心主义又重新确立。向外扩张的运动不断把中国的边界向南推展,以致朝鲜、北越和中亚细亚都成了中国的前哨。”<sup>[2]</sup>(P8-9)

由于上述历史的因素,加之地理上存在的实际阻隔(在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的时代,中国的庞大版图使得它处于一个独立于南亚及欧洲大陆之外的孤岛状态),是以在尚未完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明朝时期(毕竟还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这样一种世界秩序的观念笼罩之下,庞大而古老的中华帝国即已沉醉于“唯我独尊”的幻想之中,而且并不愿正视世界(天下)分为五大洲,中国仅为其中之一小部分的现实,即便是在利玛窦带来了西方建立在先进科学测量技术之上的世界地理知识之后。

据记载,利玛窦在未入京之前,居于肇庆府时代即已开始“一方面收集中国地图资料,寄回意大利,另一方面利用中国和西方的地图资料编绘世界地图。介绍给中国的第一幅世界地图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在

肇庆绘制成功,图名取《山海輿地图全图》(又译《万国輿图》)”。<sup>[3]</sup>(P172)由于这是首次出现于中国人面前的世界地图,故绘制完成之后,该图即在地方官员中广为流传,较为知名。但进京觐见时,利玛窦却并未向神宗皇帝出示此图,而代之以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万国图志》,利玛窦的解释是,他未曾以此图献皇帝,亦未尝欲他人为之,深恐皇帝可能因图内中国所处地位之小,而误以为吾有意侮辱中国。而从后人的描述来看,此图“对中国人来说已是从未见过的奇图,因为中国人过去所看到的地图都是将中国本部绘在中央,四周是大海,海中散布若干小岛,而这些小岛便是中国人认为的外国。可是这幅却描绘出了一个庞然世界,中国则被安放在不显眼的角落,而且看起来也不很大”。<sup>[3]</sup>(P172-173)实则利玛窦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此图后来在地方刊刻之后,果然引起某些官员的不满,以“西洋地理学家置中国于地图之极东一角,则怒”。<sup>[4]</sup>(P173)因此,使得利氏在后来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把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经过加那利群岛的子午线)的投影转移,将中国的位置绘在图的正中,并尽量用中国的旧地名,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于此可见,由于科学地理知识的贫乏所带来的妄自尊大心理正是此后清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根源所在。

实际上,地理知识的贫乏只是古老的中华帝国唯我独尊,固守传统观念,不愿正视现实的客观原因,从主观原因方面来看,对于封建帝王统治者而言,这种否认世界五大洲的存在,认为中国“居天下之大”的传统自大心理则是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维护封建专制权威的知识背景,故而绝不愿被传教士的“奇技邪说”所惑,所以万历皇帝收到《万国图志》后,也只是作为“外藩”所贡之物,浏览之后,即收入内府,束之高阁,没有流传到社会上去。利玛窦之后,虽有艾儒略、庞迪我、南怀仁等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又继续刊刻《职方外纪》、《坤輿全图》、《坤輿图说》等其他地图及地理著作,但这些书或图或被斥为荒诞之说,如《清朝文献通考》即指“意达里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诬”,或被视为西洋玩意儿,并没有被时人所重。传教士们希图以西方科学知识为饵,使中国人“落入教会网中”的策略,实难奏效。其后,清初康熙、乾隆年间测绘《皇輿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等时,不过只运用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经纬制图法,而仍以昭示吾皇威仪,炫耀版图辽阔为出发点。正是在这种拒绝对西方科学地理知识的深入了解,从而难以形成正确的世界秩序观念的态度影响之下,使得从明末至清代,古老中华帝国的子民仍笼罩在“皇朝威仪”的封建专制观念之下,只知“祖制”、“王法”之别,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彼时的欧洲在科学与宗教的双重影响之下,却已发展出许多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各个国家依赖于相互之间的权力平衡来维持,各自有其法统,而并不像中国一样,在理论上由真命天子统一和集中,实际上由于缺乏主权平等的概念,使得所有的地方政权都从属于中央和令人敬畏的皇帝权力。

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虽未动摇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帝国”、“王朝”观念,但是,他们所传人的地理知识对于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天朝中土”思想毕竟有一定力量的冲击,在少数官员如明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光启、科学家太仆卿李之藻等那里得到了回应,共同促进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在华传播,成为此后清末西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先导,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推动力之一。

## 二

此后清王朝一直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虽仰赖极端的集权制度得以维持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但其渐与世界大势相左的盲目自大早已显露了后来陷于困厄的征兆。迄至 19 世纪中期,在拒绝了明末温和善意的文化交流之后的百余年里,清王朝逐渐陷入由腐败所造成的内在忧患之中,难以抵挡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革命后极欲扩大国际市场的野心,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在来自西方的屈辱与逼迫中正式开启。

从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到甲午海战后的戊戌维新,中国的近代化逐渐从器物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尤其是对后来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影响巨大的制度层面改革,由对封建皇权制度的维新改制,渐趋于对皇权制度存在之合理性的怀疑,最终以辛亥一役敲响了封建皇权专制的丧钟,“封建王朝”为“民主共和国”所取代。这不仅标志着以一种更先进的制度代替落后腐朽的旧制度,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由“一姓天下”到“民族国家”思想观念的转变才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关键所在。在这种观念转变中,传教士所做的科学文化思想传播工作功不可没。

此时的中国,在利氏等人已有所努力的情形之下,继又由于清朝一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其国人地理知识仍然贫乏到无知的地步,甚至连道光皇帝都不知“英吉利”为何物,“天朝中土”的观念依然是来华传教的教士们所难以说服的顽固观念。在此情况下,在宣扬基督教义的本职工作而外,与利玛窦等传教士们一样,从在 19 世纪初海禁之下偷偷潜入中国内地活动的马礼逊,到鸦片战争之后在内地获得合法传教权的林乐知,众多络绎不绝来到中国为宣讲圣主福音的传教士仍然以西方科学知识为其在中国活动的试金石,而尤以天文地理知识为重点,从而再次掀起一波中西文化传播交流的高潮。

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的纯以传教为目的的六份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 年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23 年创办;《天下新闻》,1828 年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23 年创办;《依湿杂说》,1837 年创办;《各国消息》,1838 年创办)中,有详细资料可以征引的四份报刊中均将天文地理知识的介绍作为重点组成部分。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再次为介绍世界各国情况及新闻和介绍有关天文地理知识”的文章,如《全地各国纪略》、《法兰西国作变平复略传》、《英国土产所缺》等”<sup>[5]</sup>(P49),“自第 6 卷起增辟《全地各国纪略》一

栏,介绍欧、亚、美、非洲一些国家的概况,包括中国的概况”。<sup>[6]</sup>(P254);《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所载内容为宗教、时事、历史、地理及杂俎等”<sup>[5]</sup>(P53);《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该刊主要栏目有论说(或书札)、历史、地理、天文、商情及新闻等”<sup>[5]</sup>(P54),“占相当大篇幅的历史地理知识,也是为该刊的宣传方针服务的。由麦都思执笔的历史著作《东西史记和合》,旨在说明中国历史的沿革‘与西国略同’,所以中国与西方各国不应相互隔绝。大量关于东南亚各国和印度情况的介绍,是在把眼光引向中国疆外,以打破中国人的锁国思想并宣传英国统治殖民地(印度)的政绩。介绍各国情况时附有着色地图多幅(色彩是印后后加上去的)”<sup>[6]</sup>(P267);《各国消息》,“所谓国际新闻,大多并非真正的新闻而是有关一些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的介绍,旨在改变中国人思想闭塞状况和宣扬英国统治殖民地的威力与德政”。<sup>[6]</sup>(P270)

另外两份,即《天下新闻》和《依湿杂说》,由于保存下来的资料不多,难以考察它们的具体情况,但可以大致推算出天文地理知识也应该是其组成内容之一。恰如方汉奇所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所言,传教士报刊大量介绍天文地理知识的目的仍是以改变中国人传统思想中的封建迷信与自大情结为要务,从而利于基督教教义的传播。但是,这些科学知识的传入,客观上扫除了中国人思想中的愚昧落后成分,为以现代科学观念培育新式国民起了奠基作用。尤可重视的是,与利玛窦等先驱多在官僚阶层及朝廷游说不同,由于此时的传教士是以下层民众做为传教的主要对象,因之也将科学启蒙的目光投到了下层民众身下,上述报刊均以识字不多的劳苦大众为目标读者,这就使得传教士所苦心经营的科学知识传播借助于报刊及办学校、办医院等途径在于民众中间普及的意义上获得了更大的成效。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前后,迫于国势衰颓,列强的虎视眈眈也使得上层士绅官僚阶层在西方强大军事及科技力量面前开始进行反省。一批具有先进眼光的官员士人,在传教士所带来的新信息新观念影响之下,开始从地理图志入手,寻求中国的自强之策,计有以下一批“了解夷情”的著作在此时出现。<sup>[7]</sup>

《四洲志》由林则徐组织编辑,1840 年成书。林则徐出任禁烟钦差大臣之时,目睹沿海文武昧于域外形势的紧迫局势,以“了解夷情”为要务,开始收集外国情报,其重点即在于对西方列国的正视及对世界大势的把握,在《四洲志》中,有一类《洋事杂录》就是记述亚、欧、美、非等四洲简况。

《海国图志》由魏源编撰,1842 年刊刻。其内容包括:“……其次,是舆图。其中包括海国沿革图,地球正背面图,亚细亚、利未亚、欧罗巴、亚美利加四大洲的各国图 76 幅;第三是志。全书以 71 卷的篇幅,分别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舆地情况……是当时国人自编最为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书。”

《康车酋纪行》由姚莹编撰。1847 年刊行。姚莹鉴于国人对世界舆地的无知及鸦片战争的惨败,把传播世界地理知识当作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康车酋

纪行》涉及英、法、俄、印等国的史事,并绘有中外四海輿地图。但不系统,是一部杂录性的专著。

《瀛环志略》由徐继畲编撰,1848年刊刻。全书以图为纲,比较准确、完整而又简洁扼要地叙述了世界四大洲(亚细亚、欧罗巴、阿非利加、亚墨利加)及其所属各个地区、国家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沿革等情事。

此外,还有《海国四说》(梁廷木丹编撰)、《英吉利纪略》(陈逢衡撰)及对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绘制的《坤輿全图》进行订正补充后的《万国大地图》等地理(图)著作。

这些官绅士人对近代地理科学知识及各国历史情况的介绍,表明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以往关于“天下”的传统观念,如实反映了中国以外的客观世界,对于地球的全貌、经纬度、南北极、五大洲、四大洋都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从而使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仅限于“蛮夷之地”的初始印象开始转变,逐渐认识到所谓的“蛮夷”原来也是不亚于“天朝中土”的先进国度。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介绍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正遭受这些国家侵略的现实,又促使著者由注意地理、历史的差异进而开始反思政治体制的不同,向国人灌输了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的西方文明体系,即以国家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立宪制度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制度,这是与中国传统的君主万世一系、乾纲独断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也与儒家文化确立和捍卫的君臣伦常相异。由魏源等人在书中流露出来的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向往可以看出,西方的“国家”观念开始动摇中国传统的“王朝”思想。

于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是传教士的科学知识普及工作,一方面是官绅士子对国事命运的关注,中国社会从上层官僚到下层民众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由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介绍入手,重新构筑世界秩序,并在中西比较中,将思考的着力点渐由自然资源、地理条件的差异转向立国制度(政治制度)的不同。这便是构成国人在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在现实中遭遇挫折之后,思以更进一步革新的背景之一。

### 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传教士着力进行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地理及历史科学知识的传入,对于改变国人对于世界本身及中国在世界中所处地位(即“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并借由鸦片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意识,在改变“世界秩序”观念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国家革新改制的途径,使传统的皇朝权威遭遇现代立宪政治的挑战。甲午海战之前,这种挑战此时尚处于躬自反省的自觉意识当中,甲午之后,就已演变为大不敌小的现实煎迫,以维护“祖宗家法”为首要考虑的“王朝”思想在西方现代国家(日本虽地处东方,但其崛起完全在于明治维新后的诸多西化制度,从文明的角度而言,当属西方国家范畴)的大举入侵面前,显得脆弱不堪。于是,在对现实危机感受更为急迫的上层官绅阶层及士人中间,涌动着变革制度,以救危亡的暗流。戊戌维新即为这股暗流冲决而发的后果。其时,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明

确提出“开议院”、“废科举”、“兴学校”、“设报达聪”等颇具西方立宪政治制度特色的主张,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已经超越器物层面的更新引进,而进至制度层面。康、梁所提出的这一套改制设想,究其实质来说,完全异于中国历史演进以改朝换代为传统的思路,在挽救大清王朝的颓势之外,其着力点更重于“国家”、“民族”等现代概念上。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中国政治制度根本不可能龔生出西方的立宪观念,而所谓“国家”、“民族”意识更无法从几千年的封建集权专制中找到存在的依据,则康、梁等颇具现代色彩的政治理论之提出,其根源在于西方传教士的西方科学文化传播当中。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内地获得合法传教的资格之后,传教士们继续创办报刊,且宗教色彩较此前为淡,而以传播西学为主要内容。配合中国社会(主要是上层官绅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中愈益明显的改革要求,这些由传教士所办的报刊更加注重于政治方面之西学知识的介绍引进,即“由教而政”,满足了上层官绅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思想遭遇挑战之后,急于寻求新思想新道路的要求。如在当时上层社会中有极大影响的《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1868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即以对西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大量介绍而为时人所重,如康有为即是在1882年路过上海之时,购得《万国公报》,而得以周知世界大势、列国政情,梁启超也在《西学书目表》下卷“报章”中,对《万国公报》推崇备至。至于其他各类由传教士及其主办的译书馆所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更是康、梁等维新志士提出较有系统的改制方案的理论来源。中国第一次完全异于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即戊戌维新所致力政治改制,之所以在19世纪末期出现,就在于那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特别是西学对中国思想传统的影响和改变更为其中决定性的因素。西方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在于掀起了向西方科学知识、政治制度学习、借鉴的热潮,更在于这种学习、借鉴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政治观念上由“朝代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演进,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乃至其后的现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观念层次的变革基础。

#### 参考文献:

- [1]王庆余.利玛窦携物考[A].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论丛[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 [2]费正清.费正清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 [3]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M].北京:测绘出版社,1984.
- [4]利玛窦全集·入华记录(第一卷)[A].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C].北京:测绘出版社,1984.
- [5]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 [6]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7]吴廷桢,赵颂尧.坎坷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9-37.